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前 言

二十世纪也许是人类既往文明史上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为巨大的世纪之一。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里，近一百年的历史巨变更是令人惊叹。一百五十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毁了神圣天朝的梦幻，中华民族顿时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于是，在这个有着不可思议的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中，有了锐意维新变法的先驱们的探求，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斗士们的呐喊；有了冲决封建罗网的英烈们的抗争，不甘屈辱抗击侵略者的战士们的壮举；有了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万众欢腾的喜庆，齐心协力共建新中国的豪情；亦有了风云变幻峰回路转的徬徨，雨霁云开痛定思痛的感慨。在这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我们民族脱下了长衫马褂，剪去了脑后那沉重的辫子，历经几番腥风血雨，在几千年封建王朝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度沉浮之后，今天，已经在向着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迅跑。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回味、值得深思、值得铭记的世纪！

本书试图借助演说这种特殊的文体，为读者提供一种感受、品味、思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末这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大进程的独特的角度或形式。其所以独特，是因为演说既不同于史论之抽象灰色，又不同于纯文学作品之受制于具象，而是兼有二者之长——既能集中地、全景观地展示时代风貌与历史进程，又颇具个性色彩。演说辞虽然已是文字形式，但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作者当年的音容笑貌、意气风采。书中选取的四十三位人物的八十余篇演说，无一不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色彩。

诚然，囿于编选者的学识水平以及资料条件等限制，本书的客观效果与我们的主观愿望必会存在距离，我们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品评。另外，在编著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入选名人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他们在历史长河的重要时刻，总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演说辞，弃之不忍割爱。因此，编著者欲以入选者演说辞发表的时间为序，有些入选多篇者，则以其第一篇发表的时间为准，以此为全书之编排准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多种资料与书籍，在此谨致谢意。

编者

1993年11月

总 序

周谷城

演说就是向听众发表对某个现实问题的见解，或阐明某种事理。每个人一辈子要听许多次演说，也要作不少演说，可见演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活动。

演说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四千多年前，古埃及的法老就说演讲比打仗更有威力。在古代希腊、罗马，演说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产生过希腊的伊索格拉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的昆体良、西塞罗等一大批演说家，还办了“演讲学校”。在我国古代，演说也曾经辉煌。所谓“左史记言”，《尚书》中就有不少演说名篇。《国语》、《战国策》中之言，颇与古希腊之演说词相似，亦治政治、历史、文学及雄辩术于一炉者也。《论语》其实是孔子向三千弟子传授知识时的演说精华。孟轲、商鞅、苏秦、张仪俱为雄辩的演说家。在《盐铁论》中，则可以读到西汉政治家桑弘羊精彩的经济演说。据此，窃以为演说之在中国，实有久于希腊、罗马者。

演说不仅源远流长，且有重要作用。一篇好的演说，或事实有据、逻辑严密，或慷慨激昂、豪气凌云，或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或机智幽默、妙趣横生，或数者兼而有之，足以使人坚定对崇高理想之信念；足以使人增加知识，明白道理；足以动人心弦，催人奋发；足以给人欢乐，得到美的享受。历来名家演说，不仅风靡当时，且对后世实有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两个文明建设，要做好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演说。各级党政领导、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做报告，科学家的学术报告，群众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教师向学生讲课，检察官提起公诉，律师为当事人辩护，这些都是演说。此外接待来宾，介绍经验，发布消息，讨论问题，无不要用到演说。演说要有好的效果，就不能照本宣科，而必须掌握演说的艺术。掌握演说艺术别无他途，除了从实践中学习外，再就是借鉴前人演说的成功经验。由此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共同组织力量，翻译和汇编古今中外演说名篇，成套出版《世界著名演说文库》，以飨有志于演说者，此举确系一种有益的尝试，且为文化积累所不可少。

古今中外的演说名篇数量甚多，要想一下子收集得齐全，并同时出版，难免旷日持久，甚至是不可能的。不妨成熟一批，先拿出一批来。“草鞋没样，越打越象。”这样分期分批积累起来，相信反倒易于较快、较好地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演说文库。

至于每个分册的选录范围，无妨不拘一格。既可拿演说性质作标准，如就职演说、竞选演说，外交演说，也可以演说者的身份为标准，如将帅演说、律师演说、作家演说、科学家演说。既可着眼于演说之历史影响，也可着眼于演说之趣味性，如幽默演说。凡此种种，均不成问题。

此等演说，就其演说艺术而论，固有可供借鉴者。然不独止此。历来演说名篇，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反映时代风貌，或阐发深刻哲理，或含有丰富知识，实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成为文化遗产。唯其如此，鄙意以为阅读这些演说，非独有助于掌握不同性质、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下的演说艺术，抑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丰富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

这些演说既成历史文献，即有其时代烙印，需要读者独具慧眼，善于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有几种演说，由于性质关系，尤其如此。如演说有足以影响历史者。观夫《礼运大同》，则可知人类之追求理想社会，固不自今日始；观夫伯里克利、柏拉图之演说，则可知西方政治制度之由来。其影响历史者，均可谓至深且远。然而有正必有反。历史不断进步，亦必有曲折。只讲进步，不讲曲折，则历史不完整。演说有促进历史发展者，亦必有促退历史者。只见前者而不见后者，则演说不完整。故适当选录一些具有反面意义的演说，以证历史道路之曲折，社会发展之艰难，人类前进之不易，实亦有其必要。

不揣冒昧，即以为序。

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

康有为

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保皇会首领。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未就职）。1888年首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图存三项建议，因受阻而未上达。1890年后，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变法。其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该书亦未上达。是年5月，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嘉许。后与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报》，又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亦出版《强学报》，积极推动变法运动。1898年1月，上书主张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同年6月受到光绪帝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促成了“百日维新”。以后屡上奏折，陈说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改革建议。9月，变法运动遭镇压，他逃亡国外。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7年与张勋策划复辟失败。

《古今学术源流》（1896年）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给弟子们讲学的记录稿，由康有为的门人张伯桢之子张次溪先生于六十年代初向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提供。该稿系张伯桢（1877～1949）根据光绪丙申年（1896年）听康有为授课的笔记整理而成，并经方志钦先生校点。

康有为从1888年即开始宣传并努力实践变法维新的主张，出入于宫廷内外，往来于学士政客之间，后又参与保皇复辟，一生与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大转折、大变革关系甚密，堪称思想与政治舞台上的一代风云人物。当可想见，其旨在宣传思想与政治主张的演说——不论其形式如何——亦应不少，但却未曾以文字保存并流传下来。唯有此篇《古今学术源流》，今得刊布于此，虽不曾直接宣讲这位以维新改良而著称于史的人物的救世方略，但从他对上下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源流的梳理评说中，亦可体味到他那纵观历史、放眼天下的博大胸怀与宏阔的气度。张伯桢记叙康有为讲学时的情景说：“迨及秋季，先生归来，听文讲述，放言高论，闻者动容。”当时金声玉振、撼人心魄的效果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他赖以演绎发表而为变法维新及后来保皇复辟主张的基本思想倾向。

首先可以看出，对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圣的孔子及其儒学，作者是极为推崇的。他把孔子学说视作中国学术思想的唯一正宗，而把老子与墨子学说作为两种异端加以比照。他认为：“老氏之学，失诸虚；墨氏之学，失诸实。”“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而不能行。”言下之意，唯孔子儒学为虚实得体、能行而又能传的中庸之道。在评说历代学术思想的流变兴衰的时候，也是以对儒学的态度和儒学的消亡兴衰作为判别是非得失标准的。康氏之看重儒学，在于它为社会规定了一整套“最仁”、“最公”的恒定的秩序或“制度”。唯其如此，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以致后来转而复辟保皇。

然而，在康氏看来，孔子又是一位在“制度政教皆无定”的时代中“发愤而改制”之人；孔子是要以一种“言德”、“言民”或重仁义、重民命的制度匡扶天下。这又成为康氏力倡变法维新的根据或楷模。康氏对当时天下大势的看法是：“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

才蔚起，创制立教。”他将今时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相并举，其效法孔子立教创制之志昭然明矣！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了宋代变法的王安石，虽有批评之语，但首先盛赞他“甚有气节，甚有毅力，甚有血性。当时创行新法，条理颇备……”由此亦可窥其崇尚维新之一斑。此外，在这篇讲学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康氏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涉猎、吸收。

这是一篇讲学的记录，内容甚丰，当不是一次所讲，因而每有不衔接或跳跃之处。原文如此，亦不便擅作梳理。但在选编时作了一些删节。

古今学术源流

自孔子出，百子所称道，皆孔子之制度也。孔子未生之前，制度政教皆无定。当时诸子各有改制之心，如棘成子改文从质，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或曰“以德报怨”之类，皆欲自立教，每托古以明权，孔子乃发愤而改制。故诸子所称，皆儒、墨并举。与孔子争教者，墨子也。

诸子之教，以老、墨为最老辈。老子后学两派：一派清虚，在、列是也；一派治国，申、韩是也。

与孔子劲敌者莫如墨子，老子不及也。墨子条理甚密，老子工于藏拙。老子之教“为我”，墨子“兼爱”，但无差等，卒不能行，至今不灭者惟老学。

《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易》为穷理天人之书，皆暮年所作。制作、义理，《春秋》兼有之；《易》则义理更多，莫如《乾》、《坤》二卦。孔子有经亦有纬，纬是口说，多礼学，而以发明天道为主。

天文学、历学皆出孔门。

六代之乐，皆孔子所托。《咸池》、《韶》舞隔春秋时已二千余年，岂尚有存者？余考宋乐十六调，至今只剩七字，何况当时！

李悝尽地力，即先行孔子井田之制。

魏文侯立博士，求六代之乐，即行孔教之第一人，然只行在一国。秦始皇亦甚尊孔子，立博士二百余人，二世尚立七十余人，是行至天下。至汉武帝崇尚经术，立（六经）于学官，孔教遂定一统，推行日盛，至后汉为极焉。

.....

孔子之制度，在行井田，言性理在于仁，言人伦在父子。

孔门自七十子后学外，至战国时，传道者有孟子、荀子，分两派。孟子学多在德性，荀子学多在礼，而传经则荀子为最多。

《史记·儒林传》述孔学，《任 侠传》述墨学。

晋太康九年立博士：《易》郑氏、王氏；《古文尚书》孔氏、郑氏；《毛诗》郑氏；“三礼”郑氏；《左氏春秋》杜氏、服氏；《论语》郑氏；《孝经》孔氏、郑氏。至此而西汉所立之今文皆亡矣。

《隋·经籍志》传《穀梁》者三人。传经学者至唐孔颖达而止。

六朝经学，南朝皆郑学，北朝皆王学，俱古文学也。

今文学与名节之风，至东汉大盛。汉末郑康成始集今古之大成，加以高才硕学之徒侣最多，故郑学大行而今文寝息。至晋永嘉而今文遂绝。名节自曹操荡扫于先，至何晏、王弼尚清谈，而王衍之徒唱和之，而名节遂绝。

“任”，当作“游”。

加以老佛之学、词章之学陷溺既深，六朝佛学更盛，孔子之道坠地矣。然六朝可取者尚有清议及九品中正之制。晋朝徵聘不绝，故风俗不至大坏。

自东汉之后，学术、风俗之一大变者，由于郑玄及曹操、何晏、王弼数人也。

隋、唐亦立“五经”博士，由此途进者，谓之“明经”。既立科目取士，以诗赋起自唐，故人皆习于词章，而通经渐少。故唐一代，无有能通经学者，然其读书甚博，且最重骈体，故一时读文史者正多，论名节则无矣。其人皆溺于科举，上下无复有言气节者，惟韩愈一人崛起，反骈体为古文，又能攻佛、老异端，作《原道》诸篇，于是风气渐趋于义理，且气节又高，故宋学由此而开焉。五代绝无一人言学。

论学术，分两大段：自孔子至东汉为一段，自汉末至唐、宋为一段。

孔子以前，皆讲“三世”。洪水时，人与水争；周公时，人与兽争；孔子时，人与人争。

宋儒以气质言性，亦以义理言性。荀子“性恶”之“恶”，指质朴而言。孟子之言性善未确。

武后令武士读《孙子》十三篇，遂立太公为武庙，孔子为文庙。

宋之学，始自欧阳修。激扬气节，始范高平。古文亦开于欧阳修，乃韩昌黎再传弟子。昌黎学出于文中子，为古文之源流。有宋一代，言义理，折衷于闽、洛；言文章，折衷于庐陵。宋学皆兼禅学，即本于孟子之心学，亦圣人所有，未可厚非也。

南宋之学，朱、张、吕、陆四大家，别有永嘉之学，朱子集其大成，邵子之数学，本于“先天”，“先天”本于“九宫”，“九宫”即出于《易纬》，然究非经学正派。

朱子不治《春秋》，专言义理，于孔子之道得一半。

朱子疑《左传》，谓左丘明全无义理。其精力全在“四书”，而于《大学》、《中庸》为最，于《六经》不甚精通。

通元世皆是朱学。延祐六年，立科学，以“四书”立学官，直至今日。后汉气节，孔子治效之极也；晚明气节，朱子治效之极也。

凡人之学，皆学为圣人而已。圣人以孔子为一统。孔子之道，全在于“六经”。《春秋》为“六经”之管龠，故孔子之道莫备于《春秋》。

.....

《易经》阐明天道，兼及人道。《春秋》发明人道，兼及天道。

儒教，孔子特立。传道立教，皆谓之儒。

老之教曰道。墨之教曰侠。近耶教藉罗马之力，十二弟子传教，专在救人，创为天堂地狱之说。马虾默德，谓之回。其教极悍。释迦牟尼，谓之佛。其教专以虚无寂灭，亦藉天王之力。可知立教，皆藉国家之力。

史载以《史记》为最精，以其尊孔也。汉武未立学官之前，墨学最盛。太史公特尊孔子为世家，弟子立列传，另立荀、孟两派，凡后学皆入儒林，特有卓识。

史公之立《儒林传》，特为孔学未盛耳，后世之《儒林传》无谓也。至《宋史》更别为《道学传》，甚谬。《晋书·释老传》特立，亦有卓识。

.....

孔子之教，盛行于东汉，重气节，轻名利。

墨子之学，盛行于战国，任侠一派皆是。

老子之学，分为二派：清虚一派，杨朱之徒也，弊犹浅；刻薄一派，申、韩之徒也。其与儒教异处，在仁与暴，私与公。儒教最仁，老教最暴，故儒教专言德，老教专言力。儒教最公，老教最私。儒教专言民，老教专言国。言力言国，故重刑法，而战国之祸烈矣。清虚一派，盛行于晋，流于六朝，清谈黄老，高说元妙。刻薄一派，即刑也，流毒至今日，重君权、薄民命，以法绳人，故泰西言中国最残暴。

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也；商君次之；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

.....

中国开于有夏，故统言华夏。观于汉武，威行匈奴，今北番呼中国人为汉人；唐太宗威行西域，故西番称呼中土为唐人，皆此意也。

地球自洪水以前一大劫。溯洪水之初，或为日所摄，或为他行星所触，人类几绝。禹之治洪水，不过因势利导。是时日力之摄息，地球之轨平，洪水必退，禹不过疏其未退者耳。洪水之劫，通地球皆同，可知不独中国为然。观西人所考俱断于洪水后，便知。

王安石为人，甚有气节，甚有毅力，甚有血性。当时创行新法，条理颇备，然其得力在《周官》，故流毒鲜，至害苍生，且以八股取士，沦落人才，皆刘歆所丰蔀，而谬妄至此。

.....

上三千年，兽与兽争，中三千年，兽与人争，下三千年，人与人争。

地球数千年来，凡二大变，一为春秋时，一为今时，皆人才蔚起，创制立教。

.....

墨子非儒，不非“尊天”、“明鬼”，为其相同。墨子之学，其最精处在“兼爱”，“尚同”，其败绩处在“灭等威”“无差等”、“短裘薄葬”。儒家言命以范人心，设乐以和人志，墨氏皆非之。盖墨氏全是粗迹，毫无精义。

老氏之学，失诸虚；墨氏之学，失诸实。

墨子之道，与佛相类，而墨子行于身前，佛氏行于身后。墨子行之速，故败之速；佛氏行之渐，故延蔓至今日。佛氏无父母妻子，故全讲虚理；墨有父母妻子，故全讲实制。

墨子另有坚、白二派，观《大取》《小取》可知。侠派出于墨子，自汉景帝禁之，而墨学始衰。墨学战国时与孔子并，至汉，墨学衰。老学盛于魏、晋、六朝，盖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而不能行。

.....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阮籍当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乱法，君子如虱之处裸。晋世尚清谈，而王戎、王衍等为领袖，士大夫翕然宗之，晋于是亡矣。今日风俗之败坏，清谈之故也。顾亭林所谓古之清谈在老、庄，今之清谈在孔、孟，然至今孔、孟清谈并无之耳。今日清谈，流为佛学。

.....

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孟子，传孔子心学者也。荀子，传孔子礼学者也。可知战国孟子、荀子为孔子二伯。后人皆知孟子为孔子学，独不知荀子为大儒，甚可慨也。孟子、荀子是孔子的派。

（选自《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独秀 一八七九——一九四二

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 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大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成为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17 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 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3 年“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下遭受了惨重的损失。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党的总书记职务。此后他拒绝改正错误，并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反党小组，于 1929 年被开除出党。1931 年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1932 年 10 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 年 8 月出狱，1942 年病逝。

陈独秀是我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痕迹的人物。他从早年积极宣传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封建思想文化，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成立中国共产党，最后堕落为反党的托派分子，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但是他早年那些叱咤风云，领时代之潮流的呐喊，仍不失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这里选编了四篇讲演，可以让读者领略其中个味。

《劳动者底觉悟》（1902 年 5 月 1 日）一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社会上各项人只是做工的是台柱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演讲以“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设问为开篇，在回答了“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后，又深入诱导听众懂得劳动者觉悟的二种层次，用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第一步是讨饭吃，第二步是将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都拿在自己手中，“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全文简洁明了，通俗流畅。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 年 5 月 1 日）提出了残存在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于当时共和新体互为矛盾的尖锐问题。自辛亥革命成功以来，共和政体取代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可是人们脑袋中的封建思想却不像推翻封建王朝那样一夜之间一扫而光，社会上各种非驴非马现象，令有识之士忧愤如焚。陈独秀在演讲中列举了三例：其一分明挂了共和招牌，但政府考官却以“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为题选拔人才；其二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疾呼尊孔；其三分明挂了共和招牌，然文人学士则依旧推崇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嘲弄通俗的国民文学。陈独秀一语破的：重在平等精神的民主共和思想和重在尊卑阶级的封建君主思想是万不能调和的，“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近代西洋教育》(1917年7月1日)和《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4月1日)是陈独秀论教育问题的两篇重要讲演。我们知道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早年熟读古贤遗文,后留学日本,又接触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因而在论及教育的讲演中能较为系统地阐述旧教育于新教育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的区别。在上述的两篇演讲中,他具有说服力地指出了旧教育的四大弊端,形象地说明了旧教育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学生教先生的泾渭之分。又由于陈独秀早期经历了一个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转变,因此这两篇演讲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思想嬗变的轨迹。前者不无“唯有外国月亮亮又圆”之嫌,后者则较为公允地论及了我国古代教育的种种可取之处。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远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有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

今日本会开讲演会，适遇国会纪念日，鄙人不觉发动一种感想，所以选择此题。鄙人感想非他，即现今之国会非君主国的国会，乃共和国的国会。方才李石曾先生演说《学术之进化》有云：“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鄙人以为李先生的理论，固然不错，但是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

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很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歿，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

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尝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

现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就是这种现象：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不知道辨的是什么上下？定的是什么民志？不知道共和国家何以有君？又不知道共和国民是如何小法？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礼尊君的精义。若是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久要做乱臣贼子。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若是一旦帝制恢复，蔡子民先生所说的“以美术代宗教”，李石曾先生所说的“近代学术之进化”，张溥泉先生所说的“新道德”，在政治上是“叛徒”，在学术上是“异端”，各种学问，都没有发展的余地，贵学会还有什么学问可讲呢？

近代西洋教育 ——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

今日之中国，各种事业败坏已极，承贵校诸君招来演说，鄙人心中想说的话极多，但是从何处说起呢？诸君毕业后，或当教习，或别入他校求学，大约不离教育界。现在就着教育事业，略说一二：

吾人提起“教育”二字，往往心中发生二种疑问：第一是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第二是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种疑问，就是西洋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人之善恶智愚，乃天性生成，教育无效的。但是此种偏见，多数学者，均不承认，以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

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

第二种疑问，乃是中国人普通见解，以为西洋各国不过此时国富兵强，至于文物制度，学问思想，未必事事都比中国优胜；简单说起来，就是不信服西洋文明驾乎中国之上，所以不信服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方才贵校校长张先生说：“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鄙人觉得张校长这话犹是对那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人说法。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小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秋桐先生方才说道：“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鄙人以为秋桐先生此言，可谓探本之论。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

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

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照此依样葫芦，便是成功的妙诀。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至于西洋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不像那被动主义灌输主义的教育，不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只管拚命教去，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Moria Montessori）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劣害人的事以外，无人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的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意。拼命的读那和学生毫无关系的历史（小学生决不懂得自己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毫无用处的外国文，以为这就是取法西洋的新教育了。哈哈！实在是坑死人也！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

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军（Boy scout）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不像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谭嗣同有言曰：“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如何能看得起我们可厌的中国人呢？

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样，乃是最重要的。诸君毕业后，或教育他人，或是自己教育自己，请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

新教育是什么？

这篇是本年1月2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底演说，当时朴生、载扬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新青年》）上发表，因为广州底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

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底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底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

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旧教育——科举 } 形式的不同
新教育——学校 }

经史子集 } 教材种类的不同
科 学 }

照上表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 } 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 } 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哪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未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教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